

再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当代价值

王国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大学德育与青年心理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当代价值既体现在一般原则中,也体现在具体策略上。求同存异、后发制人、利用矛盾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三项主要斗争策略,这三项策略在今日中国应对外部挑战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策略;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4)03-0040-04

形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对于今日中国毫无疑问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不仅体现在一般原则上^①,而且还体现在具体策略中。本文尝试就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所蕴含的具体斗争策略做一分析,并探讨其对于当下中国应对外部挑战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主要策略

(一)求同存异、同异分置策略

新中国成立于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当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优先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关系,开展对外贸易;同时,也重视与民族主义国家(如印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发展对外关系,开展对外贸易。对于后者,我们的策略是,一方面努力寻找双方之间存在的共识,尽量缩小彼此分歧,从而在一切可能的领域里推进互利合作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正视双方的分歧,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或重大原则问题时,敢于和善于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维护中国国家权益。

以英国为例,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

国。1950年1月6日,英国不顾美国反对,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法律上之政府”。中国对此做出积极反应。1月9日,周恩来外长复电英外交大臣贝文,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接受胡阶森为英国代表来北京举行建交谈判。由于英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府存在事实上的外交关系,尤其是英国不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中英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才建立起半外交关系(代办级)。尽管如此,中国在经贸领域还是找到了与英国合作的共同点。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与英国代表团达成了在1952年内进行每方价值1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同年7月,中国政府声明:“英国的任何公司和厂商……只要是不怀垄断企图而且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都可以随时和中国的公私贸易机构进行接洽,建立联系,举行具体的业务谈判。”^{[1](P76)}1953年6月,中国政府与自称“破冰者”的英商访华团签订了贸易安排。对于中英关系的这种发展,1954年周恩来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之间相同的地方是:“第一,双方要和

^①笔者在《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当代价值》一文中从一般原则角度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现实意义作了探讨,见《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文摘》2012年第4期全文转载。

收稿日期:2014-02-01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1D092) 黑龙江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研究”(项目号HEURS0750)

作者简介:王国学(1965-) 辽宁黑山人,哈尔滨工程大学思政部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与研究。

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在国内多搞选票,就得推进中英关系。”^{[2](P81)}

但是,求同存异并不是说“同”比“异”更重要,也不是说“同”可以把“异”掩盖住从而使我们“持视而不见”的默认态度。相反,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一贯旗帜鲜明,从不模糊自己的立场,并对危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径进行必要的斗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追随美国加入联合国军入朝作战。1951年4月港英当局无理宣布“征用”中国停泊在香港修理的“永灏”油轮交给英国海军。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就此事向英方提出抗议。4月30日,中国政府下令征用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除办公用房以外的所有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1952年7月28日,英国枢密院宣布将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所属的滞留在香港的40架飞机及其它资产“判”给美国人陈纳德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8月15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令征用英资上海英联船厂和马勒机器制造厂的全部财产。10月8日,香港英国高等法院又将中国航空公司所属的31架飞机和其它财产“判”给陈纳德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11月20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令征用了英资上海电车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煤气公司和隆茂洋行。当天,天津、武汉两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征用了隆茂洋行在当地的全部财产。从1950年6月至1953年1月,港英当局先后劫夺了中国广东省人民政府水产局留在香港的5艘渔轮。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53年3月1日征用了广州英商太古公司的码头仓库及西堤楼房的全部财产。

此外,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也同英国的错误对华政策进行了斗争。1955年1月,英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称台湾“在整个二十世纪从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在四十年代有了重要的发展”。“1943年《开罗宣言》仅仅宣布了一个二战后要把台湾归还中国的意图。由于‘两个政权都声称代表中国所造成的困难及这两个政权性质的差异’,归还意图并没有履行。1945年中国军队占领台湾,并没有导致主权的改变……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属于‘法定主权尚不确定或未决定的地区’。”^{[3](P117)}更有甚者,英国首相艾德礼还提出台湾中立化主张:既然台湾对北京和华盛顿都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应该在若干年内被置于中立管辖之下”并持续到“举行一次公正的公民投票,以便让台湾人自己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3](P118)}英国的这种言论遭到中国政府的严肃批评。周恩来总理三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指出:“台湾的地位是毫无问题的,甚至连美国的白皮书和杜鲁门发表的声明都承认这一点。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陈仪既然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台湾就已经归还中国了。这是铁的事实。说台湾还没有归还中国,

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过去英国政府并没有这样说过,这是最近的一个新论调,是为了替美国开脱,使美国有权侵占台湾。”^{[2](P103)}

(二)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策略

先礼后兵,就是综合运用外交和战争两种手段来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在这里,“兵”是最后手段,“礼”是先行采取的措施。“先礼”的目的在于争取通过非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维护中国的国家权益。这样不但可以尽可能减少损失,而且还能够占据道义的至高点,使作为最后手段的“兵”成为正义之师。

以印度为例,印度是比较早地承认新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印两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一度关系融洽。但1959年之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并于1962年演化成一场边境战争。

在中国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中,“先礼后兵”的“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战之前,中国对印度的挑衅行为长期持克制忍让态度。1960年4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后,中国军队从东西两段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了20公里,以便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并且在撤出的地区停止巡逻。中国这样做,体现出了想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4](P1497-1494)}二是,中国政府在开始实行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之前,曾多次对印度的挑衅行为提出警告。^{[5](P1223-1225)}中国政府在种种和平努力失效的情况下,才被迫于1962年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对印度自卫反击战本身也包含着“礼”的因素:中国并没有仰仗军事上的胜利强占印度的一寸领土,也没有强迫印度签订城下之盟性质的条约。相反,中国军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军事胜利之后,主动退出大片有争议地区,充分显示出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的诚意。正如一位英国外交官所说:“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6](P473)}

(三)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策略

在敌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中,并非所有国家都是一个声音、一个调子。即使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反华问题上也不是铁板一块。这就为我们有效实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策略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张“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7](P764-765)}。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联合英美共同抗日的国际战略,为最后打败日寇争取到了

有利的国际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采取利用矛盾策略来打破西方的封锁。1952年4月30日周恩来在谈外交阵线时指出:“对帝国主义阵营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同我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同我不过分敌对。”^{[2](P53)}

以打破西方孤立政策为例,美国曾是遏制新中国的急先锋。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千方百计阻止国际社会承认新生的人民政权,但丹麦、英国等国家从它们自身利益出发并没有完全听命于美国,在50年代初先后与新中国建立外交或半外交关系,法国在1964年也与新中国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随着美苏矛盾的升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从60年代末开始,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重视中国的力量,并主动推动中美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发展。至1971年,中国与70多个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标志美国孤立封锁新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中国打破美国封锁政策,既是中国自身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形成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实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策略所争取到的结果。美国在西欧部署战略核武器,遭到当地和平组织和反核人士的反对,在亚洲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遭到亚洲人民的反抗。美国除了与苏联冷战之外,还与英法日等盟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或明或暗的矛盾。中国通过政治声援、经济援助、军事支持等手段广泛地与各种反美力量建立联系,扩大外交活动空间,最终使美国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破产。

二、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许多国际战略思想形成于冷战时期。尽管冷战已经结束20多年,但冷战思维在一些国家中仍然存在。战争虽然不是解决国际政治问题时最优先选择的手段,可是作为最后手段目前还不能被忽略。最近,美国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在中国周边频繁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向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出售高性能武器,搞所谓的战略再平衡,实际上是突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对亚洲事务施加影响,遏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周边影响力,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日本右翼势力也在近期活动猖獗,石原慎太郎策动上演“购岛”闹剧,把中日关系推向全面紧张。菲律宾在南海动作频繁,通过黄岩岛事件和东盟峰会来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权益。我们能否成功应对这些挑战,直接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捍卫好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能不能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赢得一个

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仔细研判,认真谋划,果断行事。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启示我们,对于任何形式的外来挑衅,都必须勇于和善于斗争。斗争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但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的基本策略对于我们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正确处理“同”与“异”的关系。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中国承认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并努力寻找共同点促进相互友好关系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中,差异意味着互补,是开展经贸往来的前提条件。但在政治领域中,差异往往造成互信的缺失。因此,正确对待差异,有效缩小分歧,不断积累互信,对于实现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良性外交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在处理“同”和“异”的关系问题上,中国采取求同存异、同异分置的策略来维护国家利益。

目前,中国和一些国家仍然存在着“异”;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欧美等国家经常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和人权状况提出批评;由于划分边界的主张不同,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大片有争议的领土;由于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当理解和利益驱使,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成为中国南海的声索国;还有,由于美国政府经常背弃中美达成的“八·一七”公报原则,中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还要对美国进行有效斗争。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印度等国家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在有些领域里相互之间利益交叉,已经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格局。因此,为了长远的战略利益,我们可以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处理,不让一般的或短时间难以解决的政治分歧妨碍双方贸易往来与经济合作。

例如,本世纪初以来,由于日本领导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关系相当冷淡,但经贸关系却十分密切,双边贸易和投资都非常巨大。这期间中日不但启动了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而且还就人民币与日元直接兑换问题进行了磋商。再如,中国与印度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中印两国的经贸往来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时重申,“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不应受到影响”^[8]

值得注意的是,同异分置策略只是把一般的分歧和特别棘手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使双方的某些“异”不至于影响彼此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这一策略的适用不是没有条件的。在涉及重大原则问题时,中国政府绝不迁就与忍让。我们主张“求大同、存小异”。

当出现“大异小同”的局面时,“异”实际已经演化成了“敌”,那时就完全可以弃“小同”而放手一搏了。当然,以什么方式搏,搏到什么规模和程度,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其次,正确处理“斗”与“和”的关系。中国奉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战争政策。但中国绝不惧怕战争。如果有人想把战争强加在中国身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勇气和智慧打败侵略者。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绝不意味着中国可以牺牲领土主权利益来换取经济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年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9]中国民间也有非常强烈的硬朗声音:“和平不是中国单方面的义务,也不是中国可以无限期提供的免费产品。”“中国不会让和平主张成为发展的负担。”“如果和平的、外交的和经济的手段用尽而仍然不能压灭周边的邪火,中国有绝对正当的战争选择权。”^[10]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十分孱弱的情况下为捍卫国家根本利益尚且不惜一战,更何况在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不过,在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方面,我们均采取后发制人策略,不开第一枪,也不主动单方面改变争议地区现状。这不是示弱,也不是希望将历史遗留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是表达出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问题的诚意。但如果有人误读中国的政策,单方面改变有争议地区的现状,中国将毫不迟疑地采取反制措施,并务求取得实效。

近期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较量就反映出中国后发制人的外交策略。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方面多次警告通过所谓“国有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决定后,中国政府于当晚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明确了该海域中国领海范围。14日,中国海监两个编队共6艘舰船抵达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海域,并对侵入的日本海上保安厅舰机进行驱离。16日,中国政府决定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

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防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接连发表声明,谴责日本“购岛”闹剧,表达坚决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与决心。中日部分政治交流活动被取消,日本在华企业经营业绩受挫。中国对日反制措施已经取得明显效果。目前,中国海监船、渔政船连续进入钓鱼岛的领海区,进行常规化的维权巡航,使钓鱼岛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再次,正确利用和妥善处理各种外部矛盾。目前世界形势呈现出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新特点。国与国之间在利益叠加、融合的同时,也经常出现矛盾与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邻国之间的领土及海域争夺,不同教派之间的信仰冲突,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解决。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里,各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且竞争越来越从军事、政治、经济领域向科技、文化、人才领域蔓延。大国之间在网络、太空、极地、远洋等所谓“新疆域”的战略较量也不断向纵深发展。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为我们实施利用矛盾策略提供了客观现实基础。

例如,在东北亚,既有韩日、俄日在一些岛屿归属上的矛盾,又有朝日、朝韩缺乏政治互信而产生的敌对,还有日美、日韩、韩美等同盟内部的摩擦。这些矛盾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解决,为中国在该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空间。2013年2月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对此中国公开发表声明加以反对,并向朝鲜提出严正交涉。朝鲜的行为与中国所坚持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主张背道而驰,因此朝鲜的核试验加大了中朝分歧,但同时也加剧了朝美、朝韩、朝日的矛盾。中国如何充分地利用这些外部矛盾,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推动更多国家接受中国提倡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引导地区热点问题朝着有利于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中国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和国际体系的建设,提倡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这些理念需要转化为具体政策措施,表现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中。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在处理东北亚复杂矛盾过程中会有精彩表现。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2)[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 [2] 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3] ROBERT BOARDMAN. Britai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74[M]. Macmillan press LTD. 1976.
- [4] 金冲及.周恩来传 1898-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5]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 1949-1976(下)[M].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3.

- [6]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印度对华战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
-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人民日报[N].2005-04-12(3).
- [9] 人民日报[N].2013-01-30(1).
- [10] 戴旭.和平若不能压灭周边邪火 中国有权选择战争[EB/OL]. 战略网 <http://mil.chinaaiss.com/html/20132/18/b5b43d.html>.

[责任编辑:赵立庆]